

陈则光 著

中国近代文学史

上册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

陈则光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46千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统一书号：10339·16 定价：(平)1.70元(精)2.70元

目 录

绪 论

- 一、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背景 (1)
- 二、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概况 (7)
- 三、中国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 (16)

第一编 太平天国前后时期的文学

(一八四〇——一八九四)

- 第一章 初期启蒙者和革新派的诗文** (26)
 - 第一节 龚自珍的诗文 (26)
 - 第二节 魏源的诗文 (40)
 - 第三节 林则徐的诗文 (54)
 - 第四节 冯桂芬、马建忠的时务文 (64)
-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文学** (78)
 - 第一节 进步的文化政策 (78)
 - 第二节 洪秀全的诗文 (83)
 - 第三节 洪仁环等的诗文 (90)
- 第三章 反帝爱国诗人及其作品** (101)
 - 第一节 张际亮、张维屏的诗 (101)
 - 第二节 朱琦、贝青乔的诗 (112)
 - 第三节 林昌彝、金和的诗 (122)
 - 第四节 陆嵩、姚燮的诗 (131)
- 第四章 旧文学流派的延续** (142)
 - 第一节 桐城派的“中兴”及其代表作家 (142)

第二节	宋诗运动及其代表作家	(156)
第三节	常州词派的主要词人	(171)
第五章	始变时期的小说	(188)
第一节	魏子安的《花月痕》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	(188)
第二节	李雨堂的《万花楼》与石玉昆的《三侠五义》	(206)
第三节	尹湛纳希的《一层楼》与文康的《儿女英雄传》	(234)
第四节	王韬等的文言短篇小说	(253)
第六章	始变时期的戏曲和弹词	(269)
第一节	黄燮清的《倚晴楼七种曲》	(269)
第二节	杨恩寿的《坦园六种曲》	(283)
第三节	陈煊的《玉狮堂十种曲》	(292)
第四节	邱心如的弹词《笔生花》	(301)

绪 论

一、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史起于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迄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国近代文学史即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它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这八十年间，经历了清代极其腐败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和清覆灭后极端黑暗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由于世界列强穷凶极恶的侵略、贪得无厌的掠夺，使中国三千年来封建政治制度开始动摇崩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解体了的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甚至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保国保种，自强自救，他们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找真理，企图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假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挽救颓局。他们因为立场观点不同，彼此之间也有矛盾斗争。这是一个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空前尖锐复杂的时代，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剧变的时代。中国近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它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承传关系，但它的主流，既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也有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它是一种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中国现代文学而带有过渡性质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殊特的意义。

自周秦起至清朝中叶，中国社会发展非常缓慢，一直停留在

封建社会阶段。这个社会在政治上是采取闭关自守的封建专制主义，它的政权是建立在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明清以来，并有了纺织业、矿业和商业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一八四〇年，英国因贩运鸦片对坚决毁禁鸦片的中国发动了战争，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声炮响。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国的枪炮面前，满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以天朝为万古不朽的迷信破灭了，与文明世界的那种野蛮而密不通风的隔绝已被侵犯，互相交往的通路打开了。”^①“那种隔绝状态既已因英国的媒介而遽遭结束，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崩离析，这同小心谨慎地藏在密封的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旦与外界接触必然要发生解体的情形一样。”^②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门既被英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而取得了非法利益，大大地引发了世界各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中国的野心。它们争先恐后、如狼似虎地向中国寻找市场和殖民地。清朝统治者在与各帝国主义交手的过程中，完全暴露了外强中干、腐朽无能的本来面貌。它既经不起无法避免的欧风美雨的侵袭，不得不迅速地走向崩溃瓦解的末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接着发生了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合入侵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德、日、英、美、法、俄、奥、意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一八五八——一八九七年俄国强迫割让黑龙江以北属地，并吞帕米尔，相继侵占伊犁和旅顺、大连，一九一四年日本对山东的掠夺。帝国主义通过这些战争和其他强取豪夺的方法，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璦琿条约、中法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强占中国的广大领土，勒索中国巨大的赔款，取得了无视中国法律的领事裁判权。

①② 马克思：《中国和欧洲的革命》

在中国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工厂，自由旅行传教。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要道和海关。并且划分势力范围，进而操纵中国的内政。使得中国形式上虽然维持独立，事实上丝毫不能自主。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战争给了古老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不可能，而固有的经济制度也不得不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发生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因素的成长。然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是不乐意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他们勾结起来，对成长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加以束缚控制。工业的一部分属于帝国主义者，一部分属于中国封建官僚，属于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一部分则受着两方面的压力和排挤，力量难以壮大，始终不能取得优势地位。同时，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因此，没落的封建经济体系既没有彻底摧毁，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未能完全建立，这样就使得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这种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促成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的日益加深。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的加深，民族的和阶级的矛盾斗争也就更加尖锐复杂了。社会经济结构是随着生产方式改变而改变的。中国由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方式，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的阶级结构的特点表现在既保存着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同时也出

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正由于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产阶级居于最高支配地位，其次封建地主阶级仍占有很大势力。从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便促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

清政府一再为帝国主义所败，丧权辱国，弱点毕露，“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妄想而自欺”^①已经不可能。于是由仇外转而惧外、媚外，终至卖身投靠；对于国内人民则进行变本加厉的政治压迫，敲骨吸髓的经济榨取，灭绝理性的精神奴役。国瘠民贫，百业凋敝，官吏横行，哀鸿遍野，帝国主义虎视鹰瞵，得寸进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主要的革命任务，就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祸国殃民的暴政，感受是非常深切的，所以“鸦片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民充分表现了不甘心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奴役的反抗精神，连续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如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的平英团运动，一八四五年广东人民的升平学社的反侵略运动，一八五〇年南方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八五二年安徽的捻军起义和以后各省多次的农民起义，一八九八年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一九〇〇年北方农民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运动。民国成立后，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权，先后发动第二次革命以及护

① 马克思：《贸易还是鸦片？》

② 马克思：《中国事件》

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这一连串的起义或革命，乃是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新势力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具体表现，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可是由于中国农民本身的弱点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领导的起义和革命，在凶恶的帝国主义和强大的封建暴力面前，一次次都失败了。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近代的历史遂告结束。

以上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背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中国近代的大量文学作品，清晰而生动地反映了这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②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首先是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即新的经济、新的政治、新的文化思想的需要。这时虽然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封建的文化思想体系仍然存留，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输入的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然社会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来说，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②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

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①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中国近代文化(自然包括近代文学)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当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当中国农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遭到镇压的时候，当时国内的政治势力分为四派，一是以慈禧太后和保守的王公贵族为代表的顽固派，坚持恪守祖宗成法，反对任何变革；二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在不改变国体和政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三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实行政治改良；四是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实行种族革命。这四派在政治战线上的斗争，相应地表现在文学战线上。改良派和革命派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文学观点也不一致。然而他们意在以改良主义或革命的方式取得本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莫不以“新学”、“西学”作为思想武器。他们在当时所提倡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都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为依据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历历可见。至于文学创作，也自然受到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使许多作家不再为传统文学所局限了。中国近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认识、分析、批判现实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为思想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改革中国社会的准则的。这种从封建主义性质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思潮，便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潮。在这种潮流下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虽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不免多少还有封建思想的遗留，但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反对残酷黑暗的专制统治的斗争，表达了各阶层人民要求民主、要求科学、要求革新国体和政体的强烈愿望，是前所未有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二、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概况

中国近代文学按其发展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太平天国前后时期，即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第二是戊戌变法前后时期，即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至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期。第三是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即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期。这样划分，是以各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所主导的文学思潮为标志的，却不能因此把各个时期截然分开。因为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是有其历史连续性的。中国近代时期不长，不少作家往往跨越两个时期，甚至三个时期。不过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总是在某一个时期起主要作用，或具有代表性，或者影响较大。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始变时期，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个变化，萌蘖于鸦片战争以前，滋长于鸦片战争以后。其代表人物为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稍后则有冯桂芬、马建忠、王韬等。他们都是目击现实而力主变革的。清代自乾隆末年，经嘉庆到道光初年，因为大兴文字狱，士大夫为之钳口；官府横征暴敛，挥霍无度；权臣和珅等贪赃枉法，民怨沸腾。农民领导的白莲教、天理教、捻军和少数民族时起动乱。而英帝国主义以贸易为名，确立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特权和专

卖权，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龚自珍、魏源等处此时代，一方面受黄宗羲的“天下为主”论，顾炎武的“学以致用”论，王夫之的民族自卫论，颜元的实用论，李塍的均田论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程、朱理学，摒弃烦琐考证的汉学，崇尚今文经学。一方面接触了西学，打开了眼界，颇有远见地来盱衡国势。在文学方面，他们不为桐城派的“义法”所囿，能直抒胸怀，评鹭时事，敢于突破传统观点。太平天国兴起之后，不论政治、经济、文化，处处与封建主义相对立。为适应广大农民的需要，所发布的文告和所创作的诗文，说理浅近，通俗易懂，以“浮文巧言”为戒，提倡“文以纪实”，很有平民文学的特色。太平天国对文学的革新，首先为近代文学树立了新风。这时期，奕訢、曾国藩等效忠于清廷的上层官僚鉴于屡败于帝国主义，于是推行洋务运动。一八六一年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翻译和招收满汉学生学习数、理、化、天文、世界史地等科。一八七二年首次派遣容闳率詹天佑等三十人赴美国留学。一八七六年又派遣严复等三十人赴英国留学，希望他们从外国学得科学技术回来，造枪、造炮、造船，建铁路、开矿山，发展各项工业，以达到“学夷技以制夷”的目的。在文学方面，呼吁变法、革新的政论文、时务文应运而生。同时涌现了大批反帝爱国诗人，如张际亮、张维屏、朱琦、贝青乔、林昌彝等，他们是这一时期的主力作家。曾国藩以正统派文学首领自居，力图挽回桐城派古文的颓势，大力扶持宋诗派，他以镇压太平天国的“殊勋”，身居高位，追随者不少，因此正统派文学在这时还有相当的势力。不过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因受潮流的推动，对于固有的观点和文风，也有所改变。

第二个时期，是文学改良运动的高潮时期。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清廷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同时表明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甲午战争之前，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提出采用

西法，实行较大改革的倡议，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主义运动也在酝酿、准备。但他们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则在甲午战争之后。因为这时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变法自强，一时鼓吹以西方为模式进行变法的著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虬的《治平通议》，陈炽的《庸书》，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又名《中国亟宜改革政治论》）等风行一时，改良主义者的保国、保种、保教的言论，甚嚣尘上。洋务派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前夕还发表了《劝学篇》一文，强调“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主教之言”，“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仍坚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保守的论调，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虽然是不彻底的，但他们在运动之初，朝气蓬勃，强调学习西方，所提改革方案，大都切中时弊，并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比起洋务派来要高明得多，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他们著书立说，成立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创办《中外纪闻》、《湘学报》、《时务报》等报刊，宣传变法维新。一八九五年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会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为光绪帝采纳，于一八九八年实行变法，不幸很快就被慈禧太后扼杀了，倾向维新的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也被消灭。这就是所谓“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维新派在进行政治改良运动的同时，也倡导文学改良，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黄遵宪的诗歌、梁启超的散文，实践了他们的主张，使诗风文风为之一变，影响极其深远。当时虽然还有桐城派古文、江西诗派的“同光体”，以及其他古诗文流派的存在，但是都莫能与之颉颃了。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他对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已经幻灭，意欲以文学为动力，开通民智，唤醒国人，以期转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改良。于是又提出“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的口号。在梁启超、黄遵宪等的倡导之下，不论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打破了传统的局限，有所创新，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一九〇〇年因义和团运动所引起的庚子事变，进一步表明了清政府完全丧失了攘外安内的能力，康、梁在政治上斥后保皇、攻击革命的议论，已落后于形势的要求了。从此资产阶级革命派便取代了保皇派占了优势，而文学改良的潮流却没有终止。

第三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的兴盛时期；以后因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所篡夺，文学随之进入了低潮时期。革命派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开始活动了，甲午战争失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一九〇三年，蔡元培、黄兴等又分别组织光复会和华兴会，与康、梁的改良主义采取对立的立场。一九〇五年，革命派的三个组织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通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出版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以上宗旨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成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也就成为领导和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们以《民报》为宣传阵地，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取得了胜利；多次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早期革命党人如陈天华、邹容、秋瑾等的作品，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激情，令读者为之动容，起过启迪群众、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但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后，都没有制定明确的文学政策，也没有人象梁启超那样重视文学，从事文学革新运动。但革命派的某些作品所表现的进步政治思想和旺盛的革命精神，则为改良派所不及。他们的文学观点和写作倾向，很不一致。孙中山、朱执信、陈天华、邹容等的政论文，受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文体比较解放；而学者兼作家的章太炎的文章则追踪魏晋，较桐城派古文更为深奥；苏曼殊则多伤感之作，迹近颓废，

作风各异。一九〇九年，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主义相号召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名成员的革命文学团体，其中一部分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的诗词，为歌颂民族民主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作出过贡献。可是由于这个团体庞大，组织⁴⁰松散，成员思想复杂，袁世凯篡政之后，便起了全面分化。这时坚定的革命派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去继续占领文坛。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鸳鸯蝴蝶派乘时而起，剑侠、侦探、黑幕小说广泛流行，肇成民初文学的衰落局面。一九一七年，胡适再次提出文学改良，与此同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以此为起点，直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遂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了。

总的说来，中国近代文学是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新诗风以龚自珍开其端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便有旧派诗和新派诗之分了。旧诗派固守前人的成规，不是学宋，就是学唐，再不然就是学汉魏六朝。作者较多的还是学宋的江西诗派，当时何绍基、祁雋藻、郑珍、莫友芝等都喜谈宋诗，连魏源也在其内。宋诗运动到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一大派别，号称“同光体”，主要作者为陈三立、郑孝胥等。学习汉魏六朝的王闿运，以刻意拟古见长；学习中晚唐的樊增祥、易顺鼎，以擅长艳体知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也间有反映时代，或抨击现实的佳构，但比起新派诗来，思想内容未免显得贫弱陈腐，形式手法始终摆脱不了前人的格套。这些故步自封、不求进步的旧派诗，不可能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新思想服务。等到维新派的黄遵宪出世，中国诗坛便出现了新的面貌。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新诗派的建立者，也是中国近代的大诗人，他从理论和创作实践，向旧诗派挑战，为近代诗歌开辟了新的道路。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展开，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文化思想阵地，倡导“诗界革命”，与文体革新取得配合，这是近代诗歌运动的一个重大发

展。革命派的文学团体南社，大都从事诗歌创作，但形式和手法仍然不是学宋，就是学唐，殊少创建。反而不如维新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富有生气。所以南社的诗人虽多，而有较大影响的并不太多。

近代的散文，以政论文和时务文为主体。这两种文体颇为相近，大都是陈述时务、议论政事的。与之相对立的是曾国藩所提倡的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古文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信守载道宗经的教条，讲求义法，当这个社会濒于崩溃，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还在唱那过了时的老调子，自然不合时宜了。严复与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曾发生广泛的影响。这些译作之所以产生影响，主要是内容，而不是古文本身。后期桐城派的古文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发生动摇，逐渐改变论调，如梅曾亮、吴汝纶、俞樾等。这时的古文，除桐城派外，骈文或骈散不分的文体也是其中一种，皮锡瑞的说经文章，便是用的这种文体。其代表作家为王闿运和李慈铭，他们同意阮元文、笔之分的说法，认为骈文才算是真正的文学，以六朝文为样板，过分地拘泥于形式，追求文章的华美，自然也不合时宜。至于步武魏晋文的章太炎，他的学术文和政论文所持的进步观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种艰深的文体，也不得不受到时代的淘汰。古文既然是过了时的文体，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的剧变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梁启超于是在已出现的政论文和时务文的基础之上，进而创立“新文体”，从形式到语言，较大程度地摆脱了桐城派古文、六朝骈文和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又称时文）的束缚，比较浅显易懂，能够表达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扩大了应用范围。维新派运用这种文体，上书投稿，议论时务，向国人讲富强之学，发表自己改良社会政治的意见，取得了显著效果，遂成为当时全国报纸杂志最通行的文体。革命派的政论文，发挥了这种文体的优点，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争取了支持者。在与保皇派的

论战中，驳斥他们的“君民同治”、“满汉不分”等为封建统治辩护的论调，起过战斗作用。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夕，《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文章仍保留“新文体”的特点。“新文体”是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散文形式，属于改良的文言文，它是古文和语体文之间的一种过渡文体。

近代的小说，曾一度空前的繁荣，其盛况在戊戌政变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二十年间。戊戌政变以前的四十多年，成书的小说作品不下四五十种，不是写烟花场中的生活、才子佳人的悲欢，就是颂美侠骨柔肠的儿女、断案如神的清官、“为王前驱”的“豪杰”，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狎邪小说、侠义小说之类，如《花月痕》、《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其中有一些可取的描写和给人以印象的人物形象，从某些侧面暴露了封建阶级的腐化和封建制度的黑暗。但它们大抵与《水浒传》、《红楼梦》反其道而行之，所宣扬的是封建阶级的思想情趣；还没摆脱一般旧小说的窠臼。在中国，向来视小说为“稗官”、“小道”，排斥在经、史、子、集之外。明代的徐渭、李贽、袁宏道，清初的金圣叹、李渔等算是打破了传统的看法，把小说提高到与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平等的地位，可是他们的着眼点无非在于才情，并没有认识到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真正的价值所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反帝爱国作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为少数风流自赏的士大夫和乐为臣仆的御用文人所运用。及至变法维新运动勃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到文学是改良社会、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和利器，各种文学品种中，小说最为有效最能发挥作用。梁启超为适应时代潮流的转变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首先提出“小说界革命”，响应者风起云涌，新闻报纸竞载小说。古文家对小说也有了新的估价，俞樾、林纾并从事小说的改编、翻译和创作。林纾曾引哈葛德的话说：“为小说者，最有权力，笔之所向，能使读者眼光